·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十六）·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十年经验与未来路径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核心命题与战略任务。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波澜壮阔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对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如何准确把握“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内涵，如何从当代中国实践与深厚历史传统中提炼具有原创性的标识性概念和理论范式，如何加快构建彰显主体性、原创性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哲学社会科学界依然面临的任务。为进一步凝聚共识、探索前路，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探索与争鸣》编辑部邀请相关领域的名家学者从理论阐释、路径探索、历史反思与学科建构等多重维度，共同探讨这一关乎中国学术未来与文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李凤亮教授从何为知识、如何自主、怎样体系三个基本问题出发，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要义、建构核心与实现路径进行了阐释。他指出，需要实现知识来源、立场与表达的三重根本性转变，其核心路径在于，以“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发生“化学反应”，从而锻造出理论创新的坚实内核。**解超**教授紧扣“加快构建”的战略要求，深刻剖析了其三重动因。他强调，“加快”的核心是在坚守正确方向与学术规律的前提下，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基础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阐明“加快构建”的内在依据，探讨如何提升知识生产的效率与质量，并在“加快构建”与“久久为功”之间寻求速度与质量的辩证统一。**孟钟捷**教授指出，“持续创新现代化理论将为中国世界史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更为坚实的根基”，其核心在于通过持续性地质疑、思考与重构，完成三重递进任务：破除所谓“经典现代化”理论的错误认知，推进解释道路多样性的“一元多线”现代化理论，并最终运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来突破西方叙事，为应对全球现代性危机开辟新空间。**雷启立**教授指出，数智时代的知识生产正经历深刻重构，在技术既带来效率亦引发焦虑的双重境遇下，必须推动育人范式与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向：从“知识传授”与“知识存量”的度量，转向“高阶思维与情感培育”以及“协同创新能力”的认证，以此在智能浪潮中捍卫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陈丹**教授指出，智能时代的知识建构正经历从“体系”到“生态”的范式革命，其核心矛盾在于算法、平台与流量重塑的生产逻辑对“慢智慧”与“共识”的挤压。对此，出版应超越传统角色，主动成为“深时间”的创设者与“共识基础设施”的构建者，在技术驱动的生态中守护文明的价值基石。**于文秀**教授强调，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两个结合”与当代中国实践为根本，同时对域外经验进行批判性“祛魅”与“解构—适配—重构”式的借鉴，最终在视域融合中贡献中国智慧。**郭庆松**教授指出，当前存在“依附性自主悖论”及其导致的“自主知识生产的结构性障碍”。破解之道在于建构“概念—文化—传播”的动态调适机制，即从提炼标识性概念与提出原创理论、在“两个结合”中筑牢文化根基以及通过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化解认可困境三个维度综合发力。

——主持人　叶祝弟　张　蕾

何为知识？如何自主？怎样体系？

——关于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再思考

李凤亮，华南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教授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尺。一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成熟与强大，归根结底取决于是否拥有一套能够深刻阐释自身实践、有效指导自身发展，并能与外部世界进行平等、深入对话的自主知识体系。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首次系统阐述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明确提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①]2022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②]这一系列重要论断，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高度，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即将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作为核心目标与根本路径。笔者曾就如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发表过一些文章。[③]本文在前面研究基础上，围绕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从“何为知识”“如何自主”“怎样体系”三个基本问题出发，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要义、建构核心与实现路径做进一步探讨。

何为知识：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要义与范式转型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首要任务在于澄清“知识”在新时代中国语境下的特定意涵，推动实现从被动接纳到主动建构的知识范式转型。这不仅是概念上的转换，更是知识生产逻辑、价值立场与文明主体性的深刻变革。在西方中心主义知识霸权长期影响下，非西方世界的知识生产常被视作对“普遍”原理的地方性“应用”或“验证”，其自身实践经验难以升华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与理论。[④]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正是要突破这一认知藩篱，其核心内涵在于实现知识来源、知识立场与知识表达的三重根本性转变。



（一）以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从“经验富矿”到“理论晶核”

知识来源于实践，伟大的实践呼唤并催生伟大的理论。然而，若仅停留于经验描述与政策解释，则无法形成系统的、具有穿透力的知识体系。“以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的关键，在于对独特实践进行深度理论抽象与概念化提炼，形成具有标识性的“理论晶核”。具体而言，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建构亟待系统推进。

首先，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总结。这超越了基于西欧北美经验的经典现代化理论范式。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要求发展理论必须回应超大规模国家在发展上的均衡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挑战了“涓滴效应”等西方主流发展经济学预设，要求构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新政治经济学框架。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需要在发展理论中重新赋予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 日，第 2 版。

② 习近平：《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6 日，第 1 版。

③ 参见李凤亮等：《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新文科》，《新文科理论与实践》2022 年第 2 期；《新时代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几点思考》，《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3 年第 5 期；《“三大体系”如何因应时代之变》，《探索与争鸣》2023 年第 9 期。

④ 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第 53—60 页。

文化价值、精神追求以核心地位，突破“物质主义现代化”的单向度视角，探索“文化现代化”的创新路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突破了“先污染、后治理”的线性发展陷阱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窠臼，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超越西方传统工业文明逻辑的“绿色现代化”理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超越“国强必霸”传统思维的鲜活案例，亟待从中国外交实践中提炼“和平崛起”“合作共赢”的理论框架。对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的深刻阐释，本身就是对现代化知识体系的重大原创性贡献。

其次，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学理阐明。中国在实践中成功探索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道路，但现有经济学理论，无论是新古典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难以完全解释“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在中国语境下的复杂互动与动态平衡。如何从学理上界定公有制主体地位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关系？如何解析“五年规划”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之间的协同机制？如何构建能够解释“新型举国体制”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效能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有可能催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经济学派。

再次，是对“大一统”国家治理传统与现代国家治理融合创新的知识化。中国悠久的“大一统”政治传统及其当代转化，构成了国家治理的深层文化逻辑。当代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弹性机制”、基层治理中“党建引领”与社会自治的结合等，都蕴含着不同于西方“权力制衡”与“多党轮替”模式的治理智慧。将这些实践智慧转化为关于国家能力、治理效能、政治整合的系统性政治学与公共行政学理论，是构建中国自主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核心任务。

（二）以中华文明立场重建叙事：从“文明对话”到“文明叙事”

知识具有深厚的文明属性，任何知识体系都植根于特定的文明土壤。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立”于中华五千多年未曾中断的文明沃土，开展关于文明的“存”与“立”的深刻工作。这不仅是挖掘传统思想资源，更是从中华文明的主体性立场出发，重建关于历史、当下与未来的整体性叙事，从而打破西方中心主义所建构的文明等级论和线性史观。

例如，在历史观层面，需要构建基于中国历史经验的历史叙事理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要求我们发展出一种能够解释超长时段文明聚合、融合与复兴的历史哲学，而非简单套用基于欧洲民族国家形成史的理论模型。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史、对“郡县制”与“封建制”的长期互动、对“天下观”与近代国际体系碰撞转型的阐释，都应产生基于中国史料和自身问题意识的历史理论范畴。

在伦理观层面，需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思想的现代转化与理论表达。“仁政”“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理念，如何经过创造性转化，为当代政治伦理、商业伦理、科技伦理、生态伦理提供不同于西方个体权利本位的话语资源和理论框架？例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如何发展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哲学和绿色发展理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如何为全球伦理与跨文明对话提供基础性原理？将这些丰富的伦理思想进行系统的哲学提炼和理论建构，是形成中国特色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关键。

在文明观层面，需要基于中华文明“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特质，构建新的文明关系理论。这为回应“文明冲突论”提供了中国智慧，也为思考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新的范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基础，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传统中。从这一传统出发，可以发展出一套关于不同文明如何平等对话、相互尊重、美美与共的文明互鉴理论，从而丰富国际关系和文化研究领域的知识图谱。

（三）构建中国特色的知识话语：从“概念输入”到“话语输出”

知识以话语为载体，概念的流动往往体现着知识权力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西方核心范畴和分析工具的“概念输入依赖”。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外化为自主的话语体系，实现从“话语消费者”到“话语生产者”的根本性转变。这需要三个层次的系统推进。

一是对“主流”概念的“中国化”阐释与重置。对源自西方但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如“民主”“自由”“法治”“现代化”“治理”等，必须根据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和实践经验，进行内涵的重释与丰富。例如，将“民主”阐释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民主不仅体现在选举投票，更体现在经济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各环节；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独特内涵。这种阐释不是简单的语词替换，而是基于不同政治传统和实践对概念本身的理论重构。

二是推动原生概念的创造与理论化。直接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和创造标识性概念，是话语自主性的根本体现。近年来出现的“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自我革命”“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等，都是生动的例子。当前的任务是，将这些植根于实践的政治术语和战略判断，进一步深化、细化为具有严谨学理内涵的学术概念，并围绕其构建起相应的理论解释框架。例如，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发展出涉及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治理理论、跨文化哲学等多个学科的子概念群，形成理论体系。

三是话语的“普遍化”提升与国际传播。中国特色话语不能自说自话，必须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和思想界进行有效对话。应将中国特色的概念与理论，提升至能为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高度，探寻其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契合点。例如，将“生态文明”理念与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对接；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与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相结合。通过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国际期刊发表、国际学术对话和经典著作译介，推动中国话语从“地方性知识”走向具有全球意义的“普遍性知识”。

如何自主：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核心与逻辑进路

“自主”是构建知识体系的灵魂，它标志着知识生产从“依附”走向“自觉”、从“应用”走向“原创”的根本性转变。实现“自主”，并非排斥外来优秀成果的封闭自守，而是在“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原则下，确立知识生产的主体性、原创性与内生性。这一过程遵循其内在的逻辑进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

（一）逻辑起点：设置“根性”元问题与“现实”真问题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理论创新的起点，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须首先在问题设置上掌握主动权，摆脱对西方学界议题的简单追随或被动回应。这要求我们具备“双重视野”：一是向内深入中华文明肌理，探寻关乎文明根脉与精神本体的“根性”元问题；二是向下扎根中国大地，捕捉源于鲜活、独特实践的“现实”真问题。

“元问题”是关于文明延续与发展的根本性诘问。例如，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中华文明的“古老性”如何转化为面向未来的“现代性”与“创造性”？这涉及传统价值、制度遗产与现代生活的衔接与转化。又如，“大一统”的国家传统与“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在当代国家建构与治理中形成了何种独特的政治逻辑与实践智慧？再如，中国“关系本位”的社会结构与“伦理型”文化传统，如何塑造了不同于西方“个人本位”的社会运行机制与治理模式？这类问题直指文明内核，对其进行深度反思和创造性回答，是确立知识体系文明主体性的根基。

“现实”真问题则是时代抛出的具体而

深刻的课题，源自中国式现代化波澜壮阔的实践前沿。例如，如何在超大规模经济体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协同推进？这需要经济发展理论、社会分配理论的重大创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其具体的、可分析的治理效能实现机制是什么？这为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议程。数字技术革命对国家治理、社会结构、伦理价值带来了何种全面而深刻的挑战与机遇，中国应如何构建数字时代的治理新范式？回答这些问题，不能依靠现成的西方理论，必须从中国场景中提炼原创的分析框架。

（二）内核锻造：推动“魂脉”与“根脉”的“结合”与“化学反应”

确立了真问题，接下来需要锻造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理论内核。“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①]为构建自主理论内核提供了根本遵循和“金钥匙”。这“两个结合”并非物理拼接，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旨在生成一种新的文化生命体和理论有机体。

“魂脉”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尤其是其关于实践的观点、矛盾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等，是分析中国问题、提炼中国理论不可或缺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坚持“魂脉”，保证了知识体系的科学性与时代性。

“根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从“民为邦本”到“以人民为中心”，从“革故鼎新”到“改革创新”，从“天人合一”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协和万邦”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展现了“根脉”的当代活力。深入挖掘并创造性转化这些思想资源，是赋予中国知识体系独特民族性、深厚历史底蕴和强大精神标识的关键。

“化学反应”的发生，要求我们在研究具体问题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与之相契合、相贯通的内容，并用中华文明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成果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例如，在构建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理论时，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分析中国古代“大一统”治理结构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同时用“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等传统治理智慧去丰富对“人民至上”执政理念的文化阐释。这种“结合”产生的理论成果，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华文化的，从而成为自主知识体系坚实的内核。

（三）成果形态：形成基于自身道路的系统化的理论学说与知识范本

“自主”的最终成果，要体现为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深刻总结与系统的理论表达。这要求我们超越零散的经验总结和个案研究，致力于构建逻辑自洽、概念清晰、能够解释实践、预测趋势、指导未来的系统性理论学说。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基础上创作《资本论》，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中国学者也应以同样的理论雄心，对中国道路进行“系统化的学说”建构。

例如，在经济领域，目标应是构建系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它不能仅仅是政策解读，而应是一套从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经济运行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收入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到宏观调控体系（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完整理论体系，能够内在统一地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应对经济周期的独特方式以及追求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

在政治与社会领域，应致力于形成解释“中国之治”的系统性政治学与社会学理论。这套理论应能够阐释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并保持活力的政治逻辑、中国社会在剧烈变迁中保持总体稳定的治理逻辑，以及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互动关系。它应包含一系列中层理论，如关于“党建引领”如何嵌入并重塑基层社会的理论、关于“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在创新活动中协同作用的理论、关于中国“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的理论等。

在文化领域，核心是建构一套能够解释中国文化何以“绵延不绝、日新月异”的学理体系。这套理论旨在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一个古老文明如何在现代世界中既保持其精神内核，又能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它包含相互关联的几个层次：首先，探究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与价值，如何能够与现代社会的需要相衔接，实现其内涵的转化与表达方式的更新；其次，分析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与技术革新如何塑造并依赖于特定的文化心态与集体认同，形成文化与社会相互滋养的机制，以及中国式人文经济学的发展逻辑；最后，阐明这种基于自身传统而又面向世界的文化发展路径，如何为理解不同文明的共存与互鉴提供了新的思考框架。这套学说的成熟，意味着对中国文化生命力的理解，从现象描述进入了原理阐释的阶段。

这些“系统化的学说”的成熟，标志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从“有”到“优”,从“点”到“面”的跃升。它们将成为世界知识图景中独具特色、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不仅为理解中国提供钥匙，也为人类探索更美好的社会制度提供来自东方的知识范本。

怎样体系：自主知识体系的实现路径与协同构建

知识体系绝非零散思想的堆砌，而是一个系统化的整体。其“自主性”的真正落地与巩固，最终要依赖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坚实支撑与协同构建。这三者犹如鼎之三足，互为依托，相互促进，共同托举起中国自主的知识大厦。

（一）筑牢基础：重构兼具主体性与开放性的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是知识体系的组织框架和制度载体，是学术活动的“地图”与“建制”。当前我国的学科体系很大程度上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产物，其学科分野、研究范式与评价标准深受西方和苏联模式影响。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然要求对现有学科体系进行深刻反思、优化与重构。

首先，强化基础学科，巩固人文底蕴。文、史、哲等基础学科是知识体系的“压舱石”，关乎价值导向、历史认知和思维训练。必须改变其被边缘化、功利化的倾向，加大投入，鼓励深耕，尤其要着力支持基于中国经典、中国史料、中国问题的深度研究，从而夯实自主知识体系的人文根基。

其次，发展优势学科，彰显中国特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党建学、中国史、中国语言文学、区域国别学等领域，中国拥有天然的素材优势和迫切的现实需求。应将这些学科作为重点突破口，集中资源将其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一流学科，在其中率先形成中国范式、中国学派。例如，中共党史党建学应突破传统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从治理型政党的视角，构建融通历史、政治、组织社会学等多维度的分析框架，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关系。

再次，大力促进新兴学科与交叉学科发展。这是打破西方传统学科壁垒、实现知识创新的关键。应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学术发展前沿，主动布局和发展诸如数字人文、计算社会科学、人工智能伦理、数据法学、生态经济学、全球学、边疆学、国家安全学等交叉领域。例如，数字人文可以利用大数据和文本挖掘技术，对中华典籍进行全新解读，催生新的历史发现和文化理论。发展这些学科，需要改革相对僵化的学科管理和评价机制，设立交叉学科学位点，组建跨学科团队，鼓励以问题而非学科为导向的研究。

（二）激发动力：完善崇尚精品与“真问题”的学术体系

学术体系是知识体系的生产引擎，其健康与否直接决定知识产品的质量。构建

自主的学术体系，核心在于营造一种能激励学者潜心钻研、勇于创新，以解决中国“真问题”、产出传世精品为导向的学术生态。

改革的核心在于建立以质量、贡献、创新为导向的学术评价体系。必须坚决破除“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顽瘴痼疾。[①]对于理论研究，应注重其思想深度、原创价值和学术传承潜力；对于应用研究，应强调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用和决策影响力。应延长评价周期，推行代表作制度，鼓励“十年磨一剑”的长期深耕，尤其要鼓励那些致力于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原创概念、构建系统理论的研究。

需建立包容而有序的学术争鸣机制。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成离不开健康的思想碰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学术发展的基本方针。应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前提下，鼓励基于严谨学术规范的不同观点、学派之间开展平等、理性的对话与辩论。这需要培育健康的学术批评文化，保护学术探索中的“奇思妙想”和“异见”，尤其要为青年学者敢于挑战权威、提出新见提供制度性空间。

应优化科研资源配置与支持机制。资源应更多向那些研究真问题、从事基础研究和交叉研究、致力于理论创新的团队和个人倾斜。可考虑设立针对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和前沿交叉领域的长期专项基金。同时，完善学术荣誉和激励机制，让坐得住“冷板凳”的学者在精神与物质上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回报，在全社会形成潜心问学、淡泊名利的优良学风。

（三）打通出口：打造融通中外、有效传播的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是知识体系的“面孔”与“声音”，是思想价值得以呈现和传播的桥梁。没有自主、有效的话语体系，再精深的思想理论也只能是“养在深闺人未识”，难以掌握解释权、定义权和传播权。

成功的本土话语构建案例，如“小康社会”（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精准扶贫”（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人类命运共同体”（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等，都经历了从政治术语到学术概念再到国际公共产品的过程。其成功的关键在于：源于生动实践，内涵清晰具体，价值指向具有普遍吸引力。未来，需继续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凝练打造更多这样的标识性概念，如围绕“共同富裕”构建系统的分配正义理论话语，围绕“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出一套描述、测量和比较民主质量的话语工具。

在国际传播上，需实施分层次、精准化的话语转换与传播策略。面向海外学术界，要着力推动高水平学术成果的外译，鼓励在国际主流学术平台上的发表与讨论，用国际学界能理解的理论语言和学术规范，讲清楚中国实践背后的学理逻辑。近年来，一些中国学者关于“贤能政治”（meritocracy）、“协商治理”（deliberative governance）的研究在国际学界引发关注与讨论，便是成功的尝试。面向海外大众和政要，则需善于运用生动案例、数据对比、故事叙述等方式，将“宏大叙事”转化为可感知、可理解的“微观故事”。同时，要积极设置和参与全球性议题，在气候变化、数字治理、公共卫生、发展融资等全球性问题上，主动提出中国方案、注入中国理念，将中国话语有机融入全球议程，不断提升话语塑造力。

综上，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者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学科体系的优化为知识生产提供了新的“赛道”和制度保障；学术体系的改革为生产高质量知识提供了内在“发动机”；话语体系的构建则为知识价值的实现提供了“传播器”和“放大器”。只有三者协同推进、良性互动，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才能从蓝图变为现实，从理念化为成果，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独特而光辉的思想力量。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时代背景与现实途径研究”（23ZDA081）的阶段性成果。］

①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2020-10-13，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010/t20201013_494381.html。

“加快”何以可能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

解超，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授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贯穿近十年的战略命题。围绕这一命题，学界从多个维度展开深入探索：一是在“自主”维度上探讨知识生产的主体性与话语权问题；二是在“体系”维度上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内在贯通；三是在实践基础维度上阐释“两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源泉意义；四是在方法论维度上关注知识生产方式变革与范式创新。《探索与争鸣》近年来组织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系列专题，从数字技术冲击、社会变迁与学术范式革命等前沿议题切入，推动相关讨论向纵深发展。[①]

然而，在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一个贯穿始终却尚未得到充分阐释的关键词也值得我们关注——“加快”。自 2016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反复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表述的背后，蕴含着鲜明的时代感与深刻的问题意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与时代要求的战略性判断。

一是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能不能迅速适应社会加速变迁的时代条件。当代中国正经历深刻而快速的社会转型，技术革命、数字化发展、人口结构变化、全球格局调整，都在不断改变社会运行方式，也不断改变知识生产的对象、节奏和方式。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不仅要回答已有问题，还要对加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保持足够的敏感性、适应性和前瞻性。二是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能不能及时回应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新的治理场景持续涌现，社会结构深刻调整。哲学社会科学的职责在于把握时代脉搏、提炼实践经验、回应现实之问。当实践的演进步伐不断加快，若理论建构的速度无法与之同频，理论供给与现实需求之间的落差便会持续扩大。因此，“加快”也深刻指向哲学社会科学回应现实问题的时效性与敏锐度。三是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能不能把实践发展的“快”真正转化为理论创造



的“能”。即是说，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持续深化的历史条件下，哲学社会科学能否形成与之相匹配的理论生产能力，在保持学术深度与理论品质的同时，将中国实践的丰富性转化为中国理论的原创性，将经验层面的独特性转化为概念层面的普遍性，进而在世界知识格局中确立中国学术的有效表达。

要回应这些问题，需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基础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阐明“加快构建”的内在依据，探讨在正确的方向上如何提升知识生产的效率与质量，并在“加快构建”与“久久为功”之间寻求速度与质量的辩证统一。

为何加快：理论之需、现实之需与时代之需

在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加快推进，不

① 参见《探索与争鸣》已发表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系列圆桌论坛和专题文章，如2024年第11期、2025年第12期等。

是一般性的效率要求，而是由中国理论发展、现实实践演进和时代格局变化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第一，实践快速发展与理论供给相对滞后之间的张力日益突出。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就已深刻指出，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多方面的重大实践课题，“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①]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现代化进程，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复杂性之高，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全过程人民民主、数字社会治理等一系列重大实践，都在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域与新的理论需求。我们在经验层面创造了大量新的治理机制和发展模式，但在学理层面、概念层面、范畴层面，还没有形成与之充分匹配的理论表达。而“越是在社会高速发展阶段，哲学社会科学对于社会历史的推动作用越是突出”。[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快”首先要解决的是实践在前、理论在后的时间差问题。

第二，国际知识竞争与文明话语重构的压力正在加大。当今世界的竞争，不仅是经济、科技、产业的竞争，也是知识生产能力、概念塑造能力和文明叙事能力的竞争。“在全球的知识社群中还存在着等级制分工，西方学者占据知识生产的上游或制高点，第三世界的学者则负责知识生产的原材料整理或初级加工。”[③]这种不对等的知识生产格局如果不加以改变，中国就可能长期处于一种尴尬境地：现实很丰富，概念却不够有力；经验很深刻，理论却不够成型；中国已经深度影响世界，但中国学术还没有完全形成与之相匹配的自主表达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④]如果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不能加快形成自主知识体系，我们就可能在事实上让渡了对中国经验的解释权。

第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经过长期积累，已经具备了提速的现实条件。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两个结合”持续拓展理论创新空间。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实践也为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极为丰厚的经验资源与研究素材。以精准扶贫的治理创新、共同富裕的制度探索为代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已经在经验层面积累了大量具有原创性的治理逻辑与发展模式，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的本土素材。这些原创性理论与创新性实践表明，中国学术界已经积累了相当数量具有解释力的本土概念和研究范式。由此，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是仓促冒进，而是在历史积累之上的自觉提速，是从持续生长走向系统建构的主动跃升。

如何加快：在正确方向上提高知识生产的效率与质量

从学理层面看，“加快”并不简单等同于成果数量的增长，也不意味着压缩学术积累的必要过程。知识生产有其内在规律，而加快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关键在于提升知识生产与时代实践之间的匹配程度，使理论创新更敏锐地捕捉现实问题，使经验积累更高效地转化为概念表达，使局部研究更自觉地走向体系建构。

首先，从实践到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把现实问题加快转化为理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⑤]“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大量原发性问题：超

①④⑤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② 韩喜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必然与路径探索》，《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9期。

③ 熊易寒：《嵌入性自主：世界知识网络中的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9期。

大规模国家如何实现有效治理与高水平参与的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形成不同于资本逻辑主导模式的发展机制？数字技术如何重塑国家、市场、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足以催生重大理论创新。当前需要“加快”的，正是围绕这些真问题形成稳定的研究议程和深度的理论积累。

其次，从概念到体系：以“两个结合”为方法论支撑，推动概念创新走向体系化建构。就概念建构而言，中国学术界已经积累了一批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原创性概念，但这些概念大多呈现相互离散、各自为战的状态，缺乏将其贯通整合的理论框架与知识网络。概念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自身的解释力，更在于它能否在一个结构性的知识体系中找到自身的位置、发挥系统性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快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在于推动中国经验实现从描述性呈现向概念提炼、理论抽象乃至体系化建构的跃升。马克思主义是自主知识体系的“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根脉”。从文明传承的维度看，中华文明在长期历史演进中形成了独立自主、自我更新的精神品格，这构成了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文化底气与精神动力。从叙事转型的维度看，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实现从长期以来以西方理论框架为参照坐标，转向以中国历史经验与现实实践为主体依据的知识生产方式，更需要以“两个结合”为支撑。因此，加快推动概念创新走向体系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方法论指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与概念土壤，同时批判吸收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成果，在贯通古今、融汇中外的视野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

最后，从思想到范式：加快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推动知识生产范式整体升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典型范式。推进这一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需要在两个层面协同发力。其一，在概念层面打通内在关联，厘清基本概念、基本论断与基本原理之间的逻辑脉络，使各核心概念不再彼此孤立，而是在相互关联、相互支撑中构成有机有序的概念系统。其二，在方法论层面把握贯穿始终的理论主线，即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确保自主知识体系在内容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在价值上具有根本方向性。

提速与深耕：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方法论自觉

在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图景中，“速度”与“质量”构成了一组充满张力的辩证范畴。将“加快”置于时代语境中考量，旨在打破既有理论的路径依赖、提升知识供给对现实巨变的响应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悬置或消解学术生长的内在周期。恰恰相反，越是处于知识范式加速迭代的关键节点，越需要以高度的理性自觉去勘定效率与深度的平衡点。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既作出了“加快构建”的战略部署，又郑重提出了“从人抓起，久久为功”的长远期许，[①] 这为我们确立了新时代知识生产的方法论基点。

其一，方向之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②]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③]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的“质量”，首先体现为能不能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能不能真正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能不能产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

其二，节奏之辨：处理好“加快构建”与“久久为功”的辩证关系。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从概念和理论起步，又需要在经验积

①②③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累与现实检验中持续深化；既需要专注本土问题的精耕细作，又需要具备面向世界的开放视野；既需要聚焦人才队伍建设，又必须推进学术共同体建设。“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既需要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也要避免浮躁、浮夸、好大喜功的心态。”[①]在这一过程中，尤其要警惕三种看似繁华实则空心化的学术倾向：一是“造词冲动”虚化理论内核，热衷于标新立异却缺乏扎实的经验支撑与清晰的逻辑边界，导致概念繁荣而思想贫乏；二是“材料堆砌”阻滞思想跃升，沉溺于海量数据的收集与现象的白描，材料丰富却止步于描述性呈现，缺乏向更高层次理论抽象与机制分析的跃升；三是“绩效逻辑”切割研究周期，任由短视化、指标化的考核主导学术议程，将本需长期积累的原创研究纳入短周期、可量化的评估框架，使研究深度让位于成果数量。真正有质量的提升，应当在优化学术创新条件、减少无效重复与路径依赖的前提下，使真正重要的问题获得更为集中的深入研究，使真正具有原创潜力的成果得以更快涌现。

其三，主体之辨：培养扎根中国大地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知识体系的建构，归根结底是人的事业。自主知识体系不是个别学者单兵突进就能完成的，它需要代际接续，需要学科协同，需要一个有思想张力、有争鸣空间的学术共同体。一方面，要在代际传承中培养一支兼具历史纵深与全球视野的学术队伍。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者，尤其是成长于国家全面崛起进程中的“平视一代”青年学者，天然具有不同于前辈的知识底气与文化心态。这一代际优势弥足珍贵，但要将其转化为真正的学术生产力，仍需在严格的学术训练中涵养勤勉治学、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学术品格，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己任。[②]在沟通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进程中，以自信而开放的姿态推动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碰撞与理论创新。另一方面，要在资源共享中构建学术共同体。马克思曾指出：“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出现的是共同体本身。”[③]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当代学术知识的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④]在实践层面，这意味着要打破学科壁垒与机构藩篱，促进学术资源的共建共享与学术信息的自由流通，营造友好交流、互帮互助的学术生态，使各领域的研究者既能在明确的分工中各展所长，又能在持续的对话中互相激发，形成一种超越个体局限的协同创新格局。同时，“从人抓起”不仅指培养学术工作者，更是要从具体的、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出发。哲学社会科学的解释力，来源于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深切理解与忠实呈现。这就要求学术研究必须回到人的社会实践、社会交往与日常生活之中，在鲜活的现实经验里寻找知识生长的根基。

其四，格局之辨：在开放对话中确立自主性。强调“自主”，并不意味着封闭排外、拒绝借鉴，而是要在广泛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保持清醒的主体立场与独立的问题意识。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恰恰需要深度嵌入全球知识网络——只有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中国的原创概念与理论范式才能在更广泛的共同体中获得检验与认可；只有深度扎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土壤，知识创造才能有效回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才能真正具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与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⑤]不辜负这个时代，就是不辜负这个时代赋予中国学术的每一个真问题、每一寸实践土壤、每一次思想生长的可能。这不仅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回应时代之问的历史责任，更是中华文明以知识形态参与人类未来想象的庄严承诺。

① 熊易寒：《嵌入性自主：世界知识网络中的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9期。

② 习近平：《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第1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48页。

④⑤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现代化理论的持续创新与中国世界史自主之路

孟钟捷，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

关注理论，尤其是聚焦理论创新，是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的重点之一。讲话全文提到“理论”有58处，明确要求“理论创新”及“新理论”共9处，并特别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在中国世界史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征程中，摸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视野的世界史理论，正是数代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现代化理论是世界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下文围绕持续推动现代化理论创新，谈三点思考。

第一，我们应该持续性地破除所谓“经典现代化”理论的错误认知。“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20世纪60年代后从英语世界（特别是美国）流行开来的学术概念，主要指的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关于这一过程出现的原因、表现形态以及最终目标的系统性观点，即现代化理论。

这一理论的最初形态源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思考。为了同社会主义阵营竞争，争取更多的盟友，美国社会科学家们通过总结经济史与政治发展历程，提出了一整套针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策略。它把美国作为“现代化的国际样板”，描述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不同阶段（如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最终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世俗化等现代性特征。这套论述后来被人们称为“经典现代化”理论。

“经典现代化”理论是典型的经验式、目的论型的思维范式，从历史来看，至少在两方面是经不起推敲的。一方面，现代化道路绝不是唯一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取决于极为复杂的历史条件，不是一蹴而就、一模一样的过程。即便在欧美国家，现代化道路也不是统一的。在英国，1640年“光荣革命”后建立了君主立宪制，但议会制改革迟至19世纪才逐渐完成。在法国，1789年大革命虽然带来了新体制，然而在随后一个世纪里共和与帝制反复出现。在德国，两次工业革命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确立，而常见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勉强立足。在美国，南北战争和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都曾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对现代制度



的稳定性提出过挑战。由此可见，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也是曲折的、分段推进的。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无法通过复制“经典现代化”道路实现转型目标。从战后历史来看，极少有新独立的国家能够运用欧美国家的发展策略完成自我更新。所谓“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虽然建起了资本主义民主体制，而时至今日也没有正式取缔种姓制，更没有完成大众生活的脱贫目标。伊朗的“白色革命”曾在一段时间内提升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但这条“全盘西化”的发展道路在20世纪70年代末走到了尽头。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一般被认为是威权主义政府而非自由市场所推进的结果。不仅如此，批判者还从“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出发，进一步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无法延循“经典现代化”方案的结构性原因，即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今天，“经典现代化”理论已成为历

史，不再是关于现代世界形成的主导观念，但其留下的一些错误认知，依然值得我们继续揭露和破除。例如，从结果来看，“现代国家”都是民族国家吗？在19世纪，欧洲大部分国家经历了一个显著的“民族化”转型过程。民族神话伴随民族历史的书写进入各国民众的国民意识中。这一潮流随后在20世纪席卷亚非拉各地，“民族国家”一时间成为现代化转型的政治符号，进而引发了一系列民族冲突和民族战争。然而事实上，是否成立民族国家并不是现代化道路上的必选项。且不论19世纪的欧洲国家不少仍属于帝国形态，多民族共存一国的情景直到今天也没有在欧洲“现代国家”里消失。美国更是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所谓“民族熔炉”的说法不过是另一种“神话”而已。

再如，从价值评判来看，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都是值得向往和赞赏的吗？在“经典现代化”的理论范式下，传统/现代的两分法被附加上鲜明的进步论色彩。已完成现代化转型的欧美国家似乎站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制高点。其实不然。在过去的20世纪里，我们见证了号称代表现代文明的欧美国家如何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屠杀其他国家的平民。在这一点上，犹太人惨遭大屠杀不过是众多悲剧中的一例而已。不仅如此，我们还能够通过越来越丰富的历史研究来揭示欧美国家是如何依靠殖民地资源实现自身发展的。印度的大片森林变成了英国铁路建设中不可缺少的枕木，非洲的丰富矿产被运往欧美国家成为“工业奇迹”的重要支撑，而这些原料产地却陷入资源枯竭和生态危机的发展困境中。

第二，我们应该持续性地推进一元多线现代化理论。在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反思和批判浪潮中，中国学者扮演过重要角色，特别是罗荣渠教授。他提出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提出的新现代化理论。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发展归根结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我们称之为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中轴原理，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一元论”。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那里，每一种生产力系统在不同的自然历史、社会条件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扩而大之，也就是社会经济形态。每种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都具有内在的结构上的相对适应性和长期稳定性，以及自身的运动规律。这样，在同一生产力水平和条件下，社会形态可以是多模式的，发展的道路也是多模式的”。[①]正是在这种一元多线现代化理论的指导下，不仅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得到了历史性研究，[②]而且也能够解释发展中国家无需也不必完全复制“西方道路”的根源。

在欧美学界，也存在着类似的想法，即“多元现代性”理论。其核心在于，“现代性不等同于西化。现代性的西方模式并非唯一真正的现代性，虽然它们有着历史领先作用，而且也仍然会是其他模式的基本参照点”。研究者还指出，“在这些起源于欧洲并从那里带来的西方式制度框架和文化框架中，不仅出现了欧洲模式或众多欧洲模式的地方变异，还发展出了崭新的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如此一来，现代世界的形成就是“多元变化的现代性相互竞争、相互对抗后不断发展、不断构建和重建的结果”。[③]

总体而言，在现代化道路的“多线”问题上，国内外学术界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从而可以避免“经典现代化”理论在应用层面的错用。但在现代化道路的“一元”问题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创新，来破除一种“迷思”，即认为唯有欧洲能率先启动现代化进程。

从历史上来看，欧洲的确在从传统转向现代的道路上领先一步。为此，不少研究者试图论证欧洲的那些先天优势，如源自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基因，或者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的“人的解放”。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前言中，也开宗明义地写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北京：中国出版集团/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5—76页。

② 参见丁建弘主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一种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③ 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任斯·理德尔、S. N. 艾森斯塔德编著：《多元现代性的反思：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郭少棠、王为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1—42页、第11页。

道：“生为近代欧洲文化之子，在研究世界史时，必然且应当提出如下的问题，即在——且仅在——西方世界，曾出现朝着（至少我们认为）具有普遍性意义及价值的方向发展的某些文化现象，这到底归诸怎样的因果关系？”[①]在他看来，近代西方由特定宗教信仰（新教的加尔文宗）所决定的理性主义才有能力开启通往现代的大门。

其实不然。这种仅聚焦欧洲本身的观念既神化了欧洲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转型的能力。国内外学者早已论证过，有能力转向现代的欧洲文明（或西方文明）并非是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直接产物，而是中世纪的产物。当时，一种新文明通过采纳和改造包括古希腊罗马文明在内的一些文化元素而整合产生。它形成的“元规则”是西方文明不变的内核。[②]不仅如此，欧美学者也承认，阿拉伯文化“唤醒了西方世界，而使欧洲走上了近代文艺复兴的道路”。[③]在所谓“大航海时代”，来自世界各地的财物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多种信息丰富了他们的视野，促进了欧洲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来自中国的各类记载也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欧洲启蒙思想家的文化反思与制度建构。[④]

这种现代文明的多源性特征在科学史学家李约瑟的晚年反思中表达得最为显著。他说：“我和我的同事一直认为只有一种一元的关于自然的科学，各种各样的人类群体均有途径通达这种科学，只不过道路或近或远；均有时参与了这种科学的构建，只不过在贡献上或多或少，在持续时间上或长或短。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希望追溯出一条绝对连续的科学之路，它始于古巴比伦天文学和医学，经由中世纪中国、印度和整个古典世界所提供的先进自然知识，到文艺复兴晚期欧洲的突破性进展——正如人们所述，关于发现的最有效的方法本身被发现了。”[⑤]

以上表明，欧洲率先向现代进行转型的原因，与其说是欧洲文明的天生使然，倒不如说世界各地文明在一个特殊时期“大汇流”到欧洲地区，结合欧洲文明的历史性发展，共同促成了人类文明的一次根本性变化。

第三，我们应该持续性地运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来解决全球现代性危机。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过程在过去两百年间席卷全球各地。现代政治和经济的运作模式、现代生活方式、现代文化观念等的各式变体，出现在欧美之外的国家和地区。

但是，现代世界并没有如欧美国家想象的那样继续走在19世纪的道路上。两次世界大战让一批帝国烟消云散，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带来了与资本主义体制平行的新规则，接踵而至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困境让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步伐陷入发展极限的恐慌之中，一股股反现代性的思潮在欧美国家内部滋生蔓延。一种全球现代性危机已经出现。

对此，有三个欧美学者的反应值得关注。第一个是冷战结束后不久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抛出的“文明冲突论”。他虽然没有按照时间线性方式来划分文明，而是根据地域来界定不同种类的文明，但其实质依然是把未能“西化”的文明都归类于非现代文明中。他这样写道：“几个世纪内，非西方民族曾一直羡慕西方社会的经济繁荣、先进技术、军事实力和政治凝聚力。他们在西方的价值观和体制中寻求成功的秘诀，如果发现自认为可能的答案，他们就尝试在自己的社会中加以运用”，“现在他们不再弱小而是日益强大，于是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攻击起那些他们先前曾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价值观。对西方的反叛最初是通过宣称西方价值观的普遍性来证明其合理性的，现在则是通过宣称非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性来加以证明”。各类非西方文明都会出现“本土化”的趋向，如“亚洲人相信这种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文化的产物”。正是在这种维度上，在亨廷顿看来，“在21世纪初期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

①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前言、第1页。

② 参见侯建新：《中世纪与欧洲文明元规则》，《历史研究》2020年第3期；陈恒：《“欧洲奇迹”神话与“西方文明”构建再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11期。

③ 菲利普·希提：《阿拉伯通史》（第10版），马坚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第4页。另参见钱志和：《阿拉伯文化的西传和西欧的文艺复兴》，《西亚非洲》1987年第6期。

④ 孟钟捷：《“多源现代性”视域下德意志启蒙思想家的中国知识生产》，《历史研究》2024年第9期。

⑤ 转引自张绪山：《重审“李约瑟难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的各民族与西方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①

与亨廷顿相对悲观的结论不同，第二种反应略显模糊性，即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现代性未定论”。早在1980年，哈贝马斯就在荣膺“阿多诺奖”时用了“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方案”这一表述。他认为，“现代”这个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各自具体界定的对象，“现在，凡是有助于使时代精神之自发更新的当下性获得客观表达的东西，都被视为是现代的”。他引用阿多诺的话来凸显“现代性”的独特一面：“破坏的疤痕是现代性的真正印记；通过这种印记，现代性绝望地否定一成不变的封闭性；爆炸是现代性的常态之一。反传统的力量成为吞噬一切的漩涡。就此而言，现代性便是神话，转向反对自己；而神话的无时间性成为打破时间连续性的瞬间所造就的灾难。”如此，他才有可能把一切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性的各种攻击包容在现代性方案的不断更新换代中。“现代性方案伴随着种种迷误，而过激的扬弃纲领也出现诸多错误，我以为，我们更应该从中学习，而不应放弃现代性及其方案本身。”②

第三种反应来自印度裔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其观点可被概括为“流转与超越论”。他直截了当地表示：“现代性与现代化的模式是以征服自然这一概念为基础，并以扩大生产为动力的。这一模式已不可持续”，“我们已经不再需要现代化革命曾经需要的文化和主体性条件。它们已经导致了人对自然征服的过度：我们现在遭遇到一种可持续发展危机——很大部分地球生物将无法在人类导致的气候变化的综合影响下生存下来”。在他看来，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亚洲国家既能够从历史中调用“能够与人类世时代全球责任产生共鸣的传统”（即流转），也在真切的“民生环保”与信仰实践中确定可持续发展的平衡点（即超越）。③

以上三种试图解决全球现代性危机的方案各有所长，但也存在明显问题。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带有典型的西方中心色彩，而且最终导向冲突。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未定论”虽然有更大的包容性，但他更多关注的是西方内部产生的反现代性浪潮，而对非西方国家的创造力缺乏深入了解的兴趣。杜赞奇的“流转与超越论”更有突破性，特别凸显了亚洲传统在革新现代性中的作用，但他最后却落脚于某种神秘物，“超越了合理限度的希望”，说“它就会指向某种超越了现实而且超越了信仰的东西——一种生存下去并寻觅着祂的动力”。④

由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便显示出它的历史意义与实践价值。它立足于中国现状（人口规模巨大），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精准解决西方现代化历史上不断出现的物质进步迅速但精神发生危机的问题（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继承文化传统与体现全球担当紧密结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保驾护航（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经历了曲折前进、螺旋上升的过程，突破了欧美经典现代化理论叙事，凸显出既实现自身跨越发展又为全球现代化进程提供包容性方案的鲜明特征。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阐释，将更有利于人们认清全球现代性危机的本质，从而为人类文明发展开辟出新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曾强调：“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⑤因此，现代化理论作为有关现代世界形成的重大命题，理应成为我们反复质疑、思考和重构的对象。持续创新现代化理论将为中国世界史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更为坚实的根基。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研究专项课题“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研究”（2025DZX03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73页、第88页、第101页。
② 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黄金城译，《文化与诗学》2019年第1期。
③④ 杜赞奇：《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亚洲传统和可持续的未来》，黄彦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30页、第5页、第15页、第50页，第337页。
⑤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数智时代的知识生产及其可能

雷启立，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上海出版研究院教授

数智时代，技术与社会各领域的变革如此剧烈，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形态和方式也随之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一切既激动人心又令人手足无措——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图像识别、垂类模型、开源社区……各种技术路线竞相突破。从产业场景的深度融合，到学术研究的创新应用，从半年到三个月，日新月异地持续迭代，且迭代周期不断缩短，让我们目不暇接。豆包、千问、Deepseek 等各类智能平台，已逐渐嵌入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似乎“有求必应”；而知识与文化的获取变得空前便捷，反而让教室里的人们不知为何而学。

一

在学术研究领域，AI 技术不仅为海量文献的搜罗与分析提供了便利，更借助对复杂社会现象的虚拟建模、跨学科方法融合提供了全新工具，推动科学探索向着更辽远广阔的宇宙空间拓展。与此同时，一种新的“创造性焦虑”也在蔓延——与既定规则和程序比较起来，那些看似异想天开、匪夷所思的灵感更令人珍视。知识生产所带来的愉悦感却在技术的高效运转中悄然稀释，甚至学术发表的传统意义也面临消解。

知识生产的手段一旦发生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怎样评价这样的知识产品，如何评价又成为新的问题。我们在学校里教书，从前多讨论“怎么教”，今天“教什么”才是更大的问题。在技术操作层面，教师需要去判断学生的作业中哪些是 AI 做的，哪些是学生真的理解与掌握了的。进而，教师是否可以使用 AI 去评判学生的作业也成为新问题。2024 年，美国某著名大学的学生状告学校收取了学生高额的学费，却有教师用 AI 批改学生提交的作业，从而质疑高额学费下的教育品质。学术期刊同样面临辨识困境：如何判定哪些内容是 AI 生成的，哪些源于人类创作？在犹犹豫豫中，人机协同创作是否可以发表。这是一个莫衷一是的时刻，一切仿佛都处在混沌和变化之中。人工智能与社会场景融合范围之广、对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影响程度之深，让人们爱恨交织，却又无处可逃。



二

我们该如何阅读和面对这样的时代？新的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可能性何在？这或许是今天困扰每一个知识分子的问题。每逢这样的转折时刻，人们就会感慨说这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同的是，1872 年，李鸿章所言的“大变局”之所以“三千年未有”，是由于西方列强带着科学技术、工业机械与民族国家之理念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扑过来，与过往所经历的中原逐鹿、改朝换代大不一样。但老话还说：太阳底下无新事。中华文明绵延发展，正是在一次次应对“新”与“变”中历久弥新。历史启迪未来，我们不妨拉开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来观察。传播史和出版史告诉我们，新技术、新媒介之“新”，总是相对于“旧”而言的。每个时代皆有其独有的“新”，并由此催生新的知识生产方式、新的文化生产机制与新的文化政治。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简略地梳理过这样的历史进程：文字的书写对于结绳记事是新的；雕版印刷相对于竹简刻写是新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相较于手抄和雕版印刷是新的。[①]16世纪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广泛运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印刷资本主义逐次展开，让手抄书走进博物馆。与此同时，经历了近千年的漫长的中世纪教士和僧侣的手抄书写的生产方式逐渐走进历史，典雅而具有美感的书写也跟着走进了历史。这显然让一切书写耽美者悲痛不已。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铅字印刷出版模式的兴起。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中，通过重塑庞库克和狄德罗两种《百科全书》的编辑、印制、传播的场景，再现了那个时代的不同技术、工程路线，让我们看到了新旧思想、传统势力和制度相互碰撞、谈判、妥协、此消彼长——过程具体而微，却极具启发。手写的艺术终究让位于印刷的速度与规模。[②]17世纪初，最早的期刊在荷兰和德国诞生。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期刊所带来的冲击与新奇，或许不亚于今天的抖音和小红书。在一种工艺技术和建基于此的社会运作机制、制度向另外一种技术和制度转化的过程当中，断裂与替代是需要特别重视的。鲜有人去追问，那些成千上万从事抄写工作的教士和僧侣上哪去了，就像电光时代没有人去关心那些印刷时代的铅字工人到哪里去了一样。“浪花淘尽英雄”，新的文化生产机制、制度以及由此而生的社会认同和相关见解，就这样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的更迭中悄然重塑。

技术的进步似乎总是领先于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由于金属活字印刷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整个社会印刷能力得以大规模提升（包括雕版印刷）。1759年，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对当时蓬勃发展的报刊提出尖锐批评：出版物数量与日俱增，真正的知识却未见增长。晨报的故事在晚报重复出现，晚报的内容又被次日的晨报抄录一遍。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情形与今天的状况相若，内容的增长不及传播生产技术的发展快，但人们关注的重心会有些微变化。19世纪70年代，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开设点石斋书局。据姚公鹤《上海闲话》记载，点石斋第一获利之书是印行《康熙字典》，采用双面缩印技术，较之以往雕版印刷的42大册，显然是小而轻便许多，迅速激发巨大市场需求，第一批印4万部，第二批续印6万部，均数月而售罄。[③]石印技术由此而兴，并催生了大量图文书的出版。在具备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条件以后，铅活字印刷技术很快就表现出摧枯拉朽的传播力量。走笔至此，正好刷到一个小视频：在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亚太峰会上，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郭毅可教授大胆预测：人类表达知识的方式会发生巨大的改变。不出五年，出版或将不复存在，机器或将取代人类书写。人们将会用另外的方式来传播我们的知识。

显然，在一个时代转换的过程中，各种技术和条件会相互影响，很难说何为因何为果。不同媒介所传播的不仅是它的内容，更有媒介自身的偏向。传播媒介的每一次大的变革都会带来思维、文明方式的巨大改变，甚至是由此带来我们身体机能和社会组织形态的改变。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本质还需要有一个重新凝聚的过程。书刊生产技术一旦变化，知识生产、接受和传播的场域和方式也很快会发生变化。1902年，清政府颁布近代中国第一个学制系统（即“壬寅学制”），约定“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中学堂四年，高等学堂及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年，大学院不立年限”。[④]1910年，又颁布《改良私塾章程》推动部分私塾向新式小学转型。为之后如鲁迅那样“走异路，逃异地”，到入新式学堂去学习“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而准备了条件。没有人追问历史上那些传道授业解惑的塾师们都到哪儿去了。因为我们清楚，教育的方式、场域和形态乃至学制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① 雷启立：《新媒体给当代生活带来了什么》，《文汇报》2011年12月19日，第12版。

② 参见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叶桐、顾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

③ 雷启立：《印刷现代性：晚清民初的技术转型和文学变革》，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80—81页。

④ 蔡可：《壬戌学制与语文即文学教育的实践》，载陈平原等著：《教育：知识生产与文学传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14页。

三

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上，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正在“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图书文献、网络、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加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构建方便快捷、资源共享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信息化平台”。[①] 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挑战我们熟悉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同时，也为哲学社会科学带来无限机遇和可能。它提醒我们，与其缝缝补补拽着我们业已熟悉的知识结构和组织形态不放手，不如退而结网去探寻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2026 年 3 月，华东师范大学发布了全球首个“AI 一作”大型社会实验成果。研究认为，在数智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范式将从“知识传授”转向“高阶思维与情感培育”，我们熟悉的文凭教育制度也将改革，从“知识存量凭证”转向“协同创新能力认证”。这些都是有益的探索。进一步地，人类自身的惰性和聪明才智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也在倒逼我们重新思考人机协作进行知识生产的边界。在这样的大框架里，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对于学术研究而言，还有多少创新有待我们穷尽？大数据与人机协同背景下，知识产权该如何认定？在大数据和量化监控下，人类仿佛无所逃避，算法的偏见和侵犯又如何规避？我们可以说我们不是人本主义者，但我们需要去追问人之为人的根本以及技术进步的终极目的：当具身智能大范围取代人类劳动时，芸芸众生的工作机会又在哪里？马克思主义所讨论的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又何在？回答好这些问题，找到走出混沌的路径，我们就能真正面对这样的时代。

四

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我们正经历的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次知识生态的重塑。扎根大地，认真梳理和直面这些变化，是我们对于这个时代之问的应有态度。回望印刷术取代手抄书的漫长历程，每一次媒介的“断裂”都伴随着阵痛，也最终催生了更丰富的文明景观。面对 AI 带来的深刻变局，被动适应或简单抗拒皆非上策。我们需要的，是一场自觉、清醒而主动的文化共建。

这显然不容易。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家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非常注重文化之间的相互生成。在他看来，文化的生产仰赖于五个主要过程，即表征—认同—生产—消费—规则。这五者之间是相互生产、环环相扣的，“循环中的每个环节都与下一个环节相连并在下一环节中重现……各个环节以一种复杂而偶然的方式不断地相互重叠和相互缠绕”。[②]这既是文化理论，更是一种思想方法。文化的生产不是某个单一向度所能完成的，它需要多主体的协同行动：于研究者而言，是在拥抱新工具时，更坚定地守护思想的原创性与人的批判精神，探索人机协同的新范式；于教育者而言，是从“传授已知”转向“探索未知”，将教学重心从知识传递迁移至思维淬炼、价值塑造与情感联结；于制度设计者而言，是敢于重构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从衡量“知识存量”转向激励“创新动能”，并为可能被技术浪潮冲击的群体铺设转型之桥；于技术开发者而言，则是在追求效率与智能的同时，将公平、透明与向善的伦理价值嵌入技术设计的底层。

变革时代的未来并非既定，而是由我们的选择所塑造。在算法与数据日益强大的时代，人类独有的同理心、历史纵深感、对意义的追寻以及面对不确定性的道德勇气，将显得愈发珍贵。让我们共同致力于构建这样一个未来：技术赋能而非剥夺人的主体性，知识传播更普惠而非更割裂，最终在数智赋能的浪潮中实现人的更大解放与更全面发展。这或许正是我们穿越当下混沌、回应“知识何为”以及“为何而学”这一时代之问的可能路径。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 日，第 2 版。

② 参见保罗·杜盖伊、斯图尔特·霍尔、琳达·简斯等：《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霍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11 页。

从体系到生态：智能时代知识建构的范式革命

陈丹，北京印刷学院教授

人类知识生产史上发生过两次根本性的知识建构的范式革命：第一次始于约公元前 6 世纪至公元前 5 世纪，其革命性在于建立了“素材—方法—理论”的知识创新体系，但知识传播几乎完全依赖口耳相传，扩散渠道有限；第二次始于 16 世纪，系统性地构建了知识创新、传播、扩散三重范式的完整协同体系。[①]如今，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的智能时代，正在催生知识建构的第三次范式革命。与前两次变革不同，这一次不是单纯的媒介更替或渠道拓展，而是知识生产主体本身的根本性重构。当人工智能不再仅是辅助知识生产的工具，而是知识生产的参与者，知识建构的底层逻辑正发生前所未有的质变。



底层逻辑的改写：从“求真”到“运算”

传统知识生产，无论是第一次范式革命中的精英思辨，还是第二次范式革命中的组织化传播，其终极指向都是“求真”。知识精英通过理性的逻辑推理与经验归纳，怀着对“绝对真理”的追寻，缓慢、审慎地建构知识的“体系”。在智能时代，知识建构的这一底层逻辑正在被逐步改写。知识的生产与验证机制，正从确定性范式迁移到流动性、关联性和概率性范式。

首先是数据主义的兴起。知识被预设为可被完全数据化，知识的对象不再是“事实”本身，而是事实留下的“数据足迹”，一切皆可量化，一切皆可分析。例如，“唐宋文学编年地图”项目，通过 GIS 地理信息系统把古代诗人的行迹投射到地图上，“让历史动起来”，这正是数据驱动知识发现的典型例证。[②]

其次是关联主义的盛行。意义不再被认为深藏于事物的本质之中，而是浮现于海量数据节点之间的关联模式。相关性取代因果性，成为更受青睐的认识工具，知识图谱的构建，其核心便是挖掘和可视化这种关联网络。例如，数字文博平台“山海”APP，把数据应用于知识图谱、多模态大模型等功能，并进一步运用在科研、教育、文创等场景。[③]

最后是概率本体论的登场。知识不再以确定的命题或定律形式存在，而是表现为概率分布、预测模型和可能性叙事，“可能是什么”比“是什么”更具操作价值，大语言模型生成文本的“正确性”往往只是一种基于统计概率的“最相似”。这一知识建构底层逻辑的转向意味着，知识生产的评价标准，已从“真实性”“逻辑性”，转向“算力友好性”“模型可拟合度”。能够被高效数据化、易于被算法处理的内容，在新的知识生态中可能更具有结构性优势。

生产流程的再造：数字知识产业的运行逻辑

如果说智能时代知识建构的底层逻辑重写，提供了知识建构范式变革的元逻辑，那么知识生产流程的再造，则深刻体现出这一变革在产业层面的影响。当知识的生产、编审、经典化等核心权力，从学术共同体、出版单位组成的“守门人体系”，部分让渡给算法、平台与流量时，我们正面临一场数字知识建构从体系到生态的运行逻辑转变。

① 邱泽奇：《人机互生：范式革命与知识生产重构》，《探索与争鸣》2024 年第 11 期。

② 牛力：《当数字人文遇见大模型》，《光明日报》2025 年 8 月 9 日，第 10 版。

③ 俞慧友：《数字文博大平台“山海”APP 在长沙发布》，2024-08-19,https://www.stdaily.com/web/gdxw/2024-08/19/content_216596.html。

其一，算法前置介入的知识生产。传统知识生产的核心逻辑是“好奇心驱动”的自主创新：研究者基于自身的学术兴趣与问题意识，自主设定研究问题、梳理文献脉络、开展研究实验并形成研究成果，编辑与评审的介入仅发生在研究成果完成之后的出版环节。而在智能时代，算法已深度介入知识生产的全流程，在研究的起点就已经充当了隐形的“第一编辑”。算法编辑的崛起，带来了知识生产效率前所未有的提升，也部分改造了知识生产的流程与逻辑：从“人想研究什么”转向“流量数据显示应该研究什么”。当算法为研究者预设了“高潜力”的研究方向，当大模型为研究者提供了标准化的研究框架，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与原创能力可能被工具所规训，知识生产可能陷入竞争加剧的陷阱。

其二，平台动态赋值的知识传播。传统的知识传播通过一套封闭的、慢速的、严谨的评审机制，完成对知识的筛选、认证和价值赋值；在智能时代，知识的评审与传播是开放的、快速的、追求流行性的，平台和算法通过多重技术手段对内容进行分类、标签、关联、排序及打包，根据不同圈层进行个性化分发，从而赋予知识以语境、价值和意义。需要明确的是，智能时代的知识传播与传统的知识传播并非是取代关系，而是共生与制衡的关系：传统的知识传播为知识生态提供了严谨性、权威性与长效性的底线，而数字知识传播为知识生态提供了开放性、流动性与大众参与的活力。

其三，流量竞争的知识扩散。传统知识扩散的广度与深度，取决于该领域群体的认可程度与内在的学术价值；而数字时代的知识扩散，遵循一种“符号化”的注意力竞争逻辑：知识被提炼、压缩为易传播的最小单元，如标签、口号、叙事原型等，以促进其实现有效扩散。知识扩散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知识本身的深度与严谨性，还取决于其能否嵌入当下的情感结构与社群话语，能否获得足够的流量。知识的符号化扩散，打破了学术圈层壁垒，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众传播，在推动知识的民主化与普惠化的同时，也带来知识碎片化和思维浅表化的潜在危机。

边界的反思：数字知识建构的系统性矛盾

知识建构在智能时代的系统性矛盾，并非表层的技术适应问题，而是深植于数字知识产业内在逻辑与人类文明积淀传统之间的根本性张力：“快知识”挤压“慢智慧”的生存空间；算法构筑的“信息茧房”持续瓦解着社会共识的对话基础；虚拟空间的高频互动替代了真实的知识碰撞。这三重系统性矛盾共同勾勒出数字知识的现实边界，也可能构成我们未来反思与重塑数字知识边界的起点。

首先，是“速度”对“深度”的驱逐。数字产业的发展逻辑需要快速生产、快速消费、快速迭代的知识产品，这是一种“快知识”；而文明的积淀需要长期浸润、深度思考的“慢智慧”。当深度思考所需的连续性、沉浸性的“深时间”被驱逐，这不仅是体验问题，更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碾压。当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快速的、专业的输出逐步替代人类独立思考，深层认知所必需经历的挫折过程等被数智技术的捷径所消解，个体便可能逐步从“知识的主动建构者”退化为“知识的被动消费者”。

其次，是“个体茧房”对“共识平台”的瓦解。当每个人都被算法编辑、算法推荐带入高度个性化的信息回路之中，在提升信息获取效率的同时，也构建了“认知茧房”。人们共享的“共识平台”持续缩小，理性的公共对话所必需的社会共识可能难以形成，从而导致我们虽身处信息的海洋，却缺少就公共议题进行有效辩论的共识平台。

最后，是“数字互动”对“真实知识碰撞”的取代。点赞、评论、转发等构成了高频的社会互动，然而这种由算法促成

的互动，往往基于相似性推荐与情绪化共鸣，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跨认知鸿沟的知识碰撞。正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所指出的“共情”与“移情”式的沟通，在追求即时反馈和信息茧房的算法环境中可能难以实现。

困境的回应：出版在数字知识生态中的新使命

传统出版范式在各种冲击下效能式微，但同时也促进了其角色的历史性跃迁。过去十年间，中国出版业经历了从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从数字出版向智能出版的双重跃迁，中国特色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也从愿景走向实践。出版对知识建构三大困境的回应，并非被动地补救，而是主动地、系统性地进行价值重塑与秩序建构。

其一，以“深时间”创设者的新定位，回应“速度对深度的消解”。面对时间被切割为可消费的“即时”的异化，出版通过将流动的思想固化为稳定的知识客体，系统性地建构了一个“深时间场域”，为被驱逐的连续性思考与价值理性，重塑了得以栖身的时空基底。出版通过打造融合图文、音视频、知识图谱的“一书一世界”，[①]创设能够屏蔽信息流干扰的“深时间结界”。同时，它未来还可以作为知识“调度中心”，对海量信息进行“深度压缩”与“动态解压”，为“慢智慧”提供生存空间。

其二，以“共识基础设施”建构者的新功能，回应“圈层对共识的瓦解”。算法推荐为每个人定制了“合身”的信息通道，但是在不经意间也可能削弱了社会交往的“共情前提”。出版正在从“反映共识”的被动角色，转向“共识基础设施”的主动建构者，铺设一片超越个体偏好、可供理性对话的“话语大陆”，从而修复公共理性的社会认识论基础。在未来，出版可以通过动态调度、关联、评价、再生知识，实现跨时空、跨主体、跨领域的深度链接，为日益分化的个体认知提供能够凝聚共识的标识性概念体系与理性讨论范式等。

其三，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的新使命，回应“数字互动对深层次交流的异化”。数字空间中的高频点赞、转发，常常是一种由算法数据驱动的“交互幻觉”，缺乏思想的真实碰撞。在此背景下，出版的破界之路，在于从提供静态知识产品转向构建良性的知识互动生态。例如，通过发起线上共读社群与线下系列研讨，将作者、行业专家与工作者以及普通读者等有效连接起来，提出真问题，进行有环节设计的深度对话，这种互动不再是基于标签的浅层交流，而是围绕严谨知识文本的思想交锋。在这里，固化的立场被挑战，认知边界得以拓展，出版由此将个体吸引到以真问题为导向的一个个微型认知网络中。

结语

智能时代的知识建构，经历了从“体系”到“生态”的范式革命，呈现出一系列深刻的内在张力：效率逻辑对深度思考的挤压，个性化适配对共识性基石的侵蚀，以及高频互动对深度沟通的削弱。未来的人工智能将更加深入地参与知识生产与社会决策，要使这一过程真正造福人类，需要在效率与可靠性之间找到新的平衡。既不能因风险而拒绝技术进步，也不能在便利面前放弃批判意识。在算法时代，信任不应建立在对机器的盲目崇拜之上，而应建立在透明、责任与持续反思之上。[②]这场范式革命的终极命题，是文明如何在技术性的“无限可能”中，守护并发展人文性的“价值内核”。出版的未来，在于构建并捍卫以个体的深度思考、社会的价值共识和理性的公共对话为基石的“平行生态”。

（感谢北京印刷学院出版学院博士研究生宋宁对本文的贡献。）

① 冯宏声：《新出版：AI驱动的产业变革与知识文化创新范式》，《数字出版研究》2025年第4期。

② 胡泳：《AI投毒：数字社会如何塑造“算法信任”》，《中国青年报》，2026-03-30，https://zqb.cyol.com/pc/content/202603/30/content_424051.html。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本土路径与域外经验

于文秀，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①]的思路展开。这一论断从空间、时间、价值等维度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全面指引：既要有立足本土的根基和坚守中华文化的立场，又要有开放的胸怀与视野，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成果，融通古今中外，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这为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处理好本土路径与域外经验的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知识范式之困与中国学术的主体性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指出：“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②]这段讲话不仅精准揭示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困境，也从战略高度指明了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性。

的确，近年来一些学者在总结学术研究时常常感叹中国学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上受西方影响过多，自近现代以来难以形成独特的建树。笔者多年前曾撰文谈到这一问题，中国学者在对外学术交流中常常处于失语状态，即使是泰斗级学人在国际学术对话中也常常处于边缘化境地，“很久以来知识界就形成了西方知识帝国主义局面，非西方学者对西方中心范式有着较为严重的依赖倾向。”[③]尽管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被动挨打和被迫对外开放的历史背景下，文化学术乃至整个社会都经历了转型的痛苦，但发展至今，中外文化与学术交流仍存在严重不对等现象。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程，始终在“冲击—反应”的被动格局中展开，从学科分类到研究方法，从概念范畴到理论框架，都深受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如中国经验常常被纳入西方理论的分析框架，



中国问题也常被置于西方概念的解释系统，中国学者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西方理论的“应用者”而非自身理论的“生产者”，大量研究停留在“以西释中”的层面，没有形成基于中国经验的概念体系与理论范式。其实，西方知识体系不仅有着自身的边界和阐释限度，更难以克服其自我中心的局限，并形成其深层的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将世界分成“西方”和“其他”(The West and the Rest)，造成其视野难以投射到“欧洲路灯以外的世界”。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批评这种局限时所说：“他们完全是在欧洲的路灯下四处观望。当他们从欧洲出发考察欧洲的‘扩张’，即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整合’时，越远的地方越昏暗。”[④]随着中国实践的深入发展，这种范式的局限性日益显现：有些本土的问题和经验无法被既有西方理论、概念充分表达或阐述。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自身文化特性，在融入全球体系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这些问题对既有话语范式提出了深刻挑战。

①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③ 于文秀：《西方中心主义与中国学术深层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15日。

④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47页。

“5·17”重要讲话正是对这一时代课题的深刻回应。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主体性”是衡量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尺度，“原创性”则是其立足的根本。“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①]这段话从根本上揭示了知识依附的危害，一套脱离本土实践的知识体系，即使逻辑再严密、概念再精致，也难以切中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5·17”重要讲话的深刻启示在于，应该将中国从西方理论的“研究对象”转变为知识生产的“主体”，从“被解释者”转变为“自我解释者”。这种转变的实质，是知识生产权力的重新配置。

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本土路径

我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在“两个结合”的视域中展开的。一方面，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确保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必须深深扎根中华文明沃土，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滋养。这种双重根基赋予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以独特的理论品格：它既不是对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简单模仿，也不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翻版，而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深度融合中生成的新的知识范式。

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哲学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知识不是先验理性的自我展开，也不是纯粹意识的静观对象，而是植根于社会实践的历史性生成。一切知识体系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产物，都会打上特定社会存在的烙印。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②]“5·17”重要讲话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其深层哲学依据正在于此。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将马克思主义定位为“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体，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本质的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的哲学基础，不在于它提供了某种现成的结论，而在于它开辟了一条从实践出发理解知识的道路。

二是立足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与实践。任何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都是对该时代“总问题”的理论把握，构成了时代知识生产的深层结构。对于当代中国面临的“总问题”，“5·17”重要讲话中给出了明确回答：“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宏大主题，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总问题”。一切学科、一切领域的研究，最终都要聚焦到对这一总问题的深入探索。自主知识体系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否真正切中这一总问题，能否从不同维度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阐释。

同时，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为知识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践基础。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不是理论创造了实践，而是实践孕育了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道路，正在为人类贡献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知识体系。

马克思曾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④]当代中国对理论创新的迫切需求，正源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独特性质。当代中国实践的核心特质，在于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一个在保持自身文明连续性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的独特道路。这一实践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也有别于其他发展中

①③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2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国家的现代化探索，它所蕴含的特殊矛盾和独特经验，本身就构成了理论创新的富矿。当代中国的社会存在，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空间。从现象学的视角看，中国实践是一种“活的经验”，它蕴含着的丰富意义有待理论阐释。我们需要悬置各种外来理论的既有预设，让中国经验在自身脉络中显现其独特意义。正如“5·17”重要讲话所强调的：“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①

知识体系的本土建构不仅涉及对当代实践的把握，还有对文明传统的开掘、转化和发展。一个社会的知识体系不可能脱离其文明母体而孤立存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赓续发展，形成了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与思维方式，这些文化基因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深层密码。我们需要对这一维度予以高度重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②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既不应是全盘继承，也不应是简单否定，而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种辩证的态度既区别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古倾向，也有别于文化激进主义的断裂取向，体现了对文化连续性与变革性相统一的深刻把握。

传统不应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活着的过去”，构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前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仅存在于历史文献中的抽象观念，而是持续影响着当代人的行为模式、社会组织的运作逻辑以及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已内化为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传统作为一种“隐性的知识”，构成了自主知识体系最深厚的学理基础。对传统的开掘不是走向封闭，而是为了更有效地参与人类文明的对话。

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域外经验

在探讨本土路径的同时，我们必须正视域外经验对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意义。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同时不陷入知识依附，这需要我们对西方知识体系进行哲学层面的“祛魅”。

知识体系的形成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其内在蕴含着特定的立场和视角。西方现代知识体系是在欧洲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它内在地反映了欧洲社会的历史经验、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因此，当它被运用于非西方社会时，难免存在解释盲区，那些无法被纳入其框架的现象，往往被忽视甚至误读。“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③真正的借鉴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而不是失去自我、随声附和。对域外经验的借鉴，不妨从知识生产规范与机制、研究方法与工具、话语传播方式等方面加以考量。

其一，将域外知识生产的规范与机制转化为适配中国语境的本土化体系。对域外学术规范和建设机制的借鉴，应遵循“先解构、再适配、后重构”的逻辑进路，使其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有益养分，而非主导性要素。遵循这样的逻辑，域外经验的借鉴边界便得以划定，那就是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核心需求为根本标尺。所谓“解构”，即区分域外知识体系中反映人类知识生产普遍规律的共性内容，与源于西方特定历史经验的特殊内容，剥离其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预设与意识形态偏见；所谓“适配”，即筛选那些契合马克思主义指导方向、适合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的有益成果，如学术诚信准则、逻辑论证方法；所谓“重构”，即结合中国的制度优势、文化传统和研究

①②③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实际，对域外建设机制进行本土化改造，如吸收域外关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智库建设、科研管理等方面的底层逻辑和成熟经验，构建以中国重大现实问题为纽带的跨学科协同研究机制，让域外经验在本土化重构中真正融入中国知识生产的肌理。

其二，对域外先进的研究方法和工具进行融贯中西的创新与转化。研究方法是知识生产的重要工具，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广泛吸收人类社会积累的科学研究方法，同时结合中国实践与文化传统，实现守正创新。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出的实证分析、计量建模、田野调查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方法，以及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建模等现代化研究手段，作为超越地域与学科的普遍性学术工具，为提升知识生产的科学性与精准度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借鉴并非简单套用，而是要以中国问题为核心，将域外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的思维和研究方法深度融贯，将那些有用、能用、好用的学术工具吸纳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实现以我为主、择善而用的视域融合。

其三，让域外传播方式成为桥梁，把握以中国叙事为核心的国际话语传播主动权。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走向世界，既不能照搬西方叙事，也不能止步于文字翻译，而应在坚守中国话语内核的基础上，主动吸收域外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的有效叙事方式与传播路径。因为，让世界读懂中国、让中国话语影响世界，需要让中国的故事和本土的理论被国际社会理解和认同。吸收域外有效的叙事方式和传播方式，如可借鉴并创新多元化的传播渠道建设、国际化的传播平台运营、跨文化融媒体传播等方式，整合国内学术、媒体资源，搭建高水平的国际学术对话平台，实现中国话语的世界传播和对话交流，最终掌握国际话语传播的主动权，让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国际学术交流与文明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域外经验的借鉴，需坚持一种批判性审视的态度，善于辨识反映人类共同发展规律与认知逻辑的普遍性知识和源于西方特定经验的特殊性知识，厘清值得吸收借鉴的有益成果与需要警惕摒弃的意识形态偏见。这种辨识能力正是主体性与自主性的重要体现。从本质上看，借鉴是一种“视域融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应带着由本土实践所生发的问题意识、自身的理论预设和价值取向去理解和运用外来的理论和方法，在与外来资源的对话中深化对自身问题的理解，规避外来理论的局限，从而实现双向的超越。

与此同时，必须深刻认识到，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是要创造一种与人类文明隔绝的特殊知识，而是要将中国经验所蕴含的普遍可能性充分揭示出来，为人类知识宝库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不是要退出人类知识共同体，而是要更深入地参与其中。它的最终目标，也不是创造一种与西方知识体系对立的“另类知识”，而是以中国经验为基础，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命题，丰富人类对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正如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贡献了新的现代化道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也将为人类贡献新的思想资源。中国学者不应再满足于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扮演地方性知识的“提供者”，而要力争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命题的“创造者”，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

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任重道远。我们要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以更加自觉的态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将历史分析与逻辑建构统一起来，在深刻理解中国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提炼理论范畴，在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基础上，建构真正体现中国智慧的自主知识体系。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突破进路

郭庆松，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授

哲学社会科学之于人类文明演进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任何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都是孕育于特定时代、以特定的社会实践为研究对象，以特定的文化现象为依存环境，并由特定的国家或民族自主构建的，这就是所谓的自主知识体系问题。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回应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现实需求，还是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选择。应该看到，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取得了一系列积极进展，一些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鲜明实践导向的标志性成果不断涌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不断增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日益凸显。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在坚持“两个结合”的基础上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并重点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所作出的理论贡献。

然而，毋庸讳言，当前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仍面临一种“依附性自主”的悖论：尽管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依靠自身努力，在整体上维持并提升了学术自主性，但在某些层面和领域中，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或受制于外部——尤其是西方——的学术资源与话语体系。这种既追求自主又难以摆脱依附的张力，构成了学术上的所谓依附自主“悖论”。这种学术“悖论”引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所谓的“自主知识生产的结构性障碍”：一些学科在知识生成、评价、传播与转化的诸多环节，因深受西方知识结构的潜在锁定，而难以突破深层结构性矛盾，以致在知识体系的“中心—边缘”格局中，仍处于被西方中心主义所包围、被动适应的边缘位置。具体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在学术话语体系层面，因表达范畴过度依赖西方范式而难以诠释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鲜活故事；在知识生产机制层面，因议题设定偏好西方理论而难以聚焦中国重大的现实问题；在学术认知评价层面，因知识体系的碎片化而难以形成自主性的学术生态；在文化传播技术手段层面，因西方主导的技术标准嵌入而难以突破跨文化的通约性局限等。基于这一现实，突破当前困境、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我们探索一种“概念—文化—传播”三位一体的动态调适机制，



并借助有效的国际传播路径实现系统性战略升维。具体而言，应从提炼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筑牢文化根基、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三个维度协同发力，使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能够在回应上述关键问题的过程中，实现动态更新与科学延展，最终形成兼具本土关怀与全球视野的方法论自觉。

在推进理论创新中提炼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

概念和理论是知识体系的基石，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突破以西方概念、外来理论为基底的知识框架，这是突破学术上的所谓依附性自主“悖论”的基础性工程。恩格斯曾明确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①]显然，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是一种学说区别于其他学说的创造性的思维形式，体现的正是这种“术语的革命”。显然，这样的“术语”不仅不同于日常用语，也与一般政治叙事中的概念有所区别。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为此，应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着力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这就进一步指明了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对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以“初心使命”“强国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等为统领，以“新质生产力”“全过程人民民主”“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等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的提出，[①]以及《人民日报》推出的“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纵横谈”围绕高质量发展、守正创新、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等所做出的系列解读，乃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正在进行各自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的提炼工作等，这些对于形成具有鲜明自主性、原创性和强大解释力、实践力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这一过程仍需要我们进一步立足中国实际、扎根人民群众，致力于构建兼具中国特色与人民底色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体系和内容框架。

一方面，必须立足中国实际，这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长”在中国的必然要求。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直面中国问题、解释中国现象。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包括需解决的主要矛盾、需改善的发展状况、需突破的实践难题等，设置研究阐释议题，依靠从中国实践中总结提炼的原创性理论和标识性概念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解答。特别地，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回应新时代中国实践问题、升华新时代中国学术话题、拓展新时代中国故事传播等方面赢得了与时代相称的辉煌成就，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旗帜指引和灵魂指导。唯有坚持和加强党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指导，我们的自主知识体系才能立得住、行得正、走得远、传得开。当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还需具备前瞻性与引领性。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交汇的时代背景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立足于国际视野，我国在某一领域面临的某一问题可能是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共同问题。理论研究应主动回应全球治理困境，为解决人类共同挑战贡献蕴含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方案，使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

另一方面，必须扎根人民群众，这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站”在人民中间的价值取向。其一，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为人民群众谋幸福。人民群众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价值依托，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理应成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的方向。这就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深入基层开展广泛调查研究，及时收集反映群众真实意志的社情民意。其二，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汲取人民群众的智慧。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实践经验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活力源泉，将其上升为科学理论并在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中广泛使用，能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奠定深厚的群众基础。其三，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检验。人民群众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成效的最终评判者，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需要提升理论话语的普遍解释力，使得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易于被人民群众深刻理解和准确掌握。如此，人民群众才能在实践中检验其真理性与实用性。同时，根据群众的实践反馈与理论诉求，持续优化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内容。

① 方江山：《牢牢把握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 扎实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人民论坛》2025 年第 6 期。

在坚持“两个结合”的基础上筑牢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根基

提炼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和前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夯实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根基至关重要。“两个结合”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遵循，也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遵循和文化根基，彰显了思想魂脉与文化根脉有机融通对于塑造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不可替代性作用。正如资本主义现代化有其深厚的资本文明根基，由“魂脉”与“根脉”贯通而生成的新文化生命体，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并由此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意味着，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也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相互契合”又“相互成就”，二者结合孕育出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生命体，正是“魂脉”和“根脉”在深层次上融合贯通的产物。从本质来说，“两个结合”不仅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指明了根本方向，也为增强这一新文化生命体的文化主体性提供了重要遵循。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之“魂”，从根本上保证了其发展的正确方向。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①]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起点，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具体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百余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双重进程中，形成了大量经过实践检验的原创性理论，这些已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向未来，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穿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全过程，自觉运用其分析并解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回应现实、推动实践中，发展出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又富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之“根”，为知识体系注入了深厚的文化主体性。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并不是对既往或其他知识体系的全盘否定或者盲目吸收，而是立足本民族精神特质，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真理性所进行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理性改造、革新与重塑。“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②]这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丰厚资源。对于其中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相融通的内容进行充分挖掘和时代阐发、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本土固有知识体系的当代转化，使其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协调。比如，中国古人所谓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治国理念与群众史观相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倡导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篇》）的大同社会理想与人类解放理论相呼应；中华文明强调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的实践重要性论点也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实践第一的基本观点相一致。这些都是“根脉”与“魂脉”相贯通的典型例证。惟有如此，方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构建中国知识体系的实践中持续焕发新生，展现其跨越时空的智慧与魅力；才能以中华文化基因破除理论概念的抽象性，丰盈其本体意涵，抵制知识生产中的文化虚无主义倾向，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注入独特标识。

以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化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认可困境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亦非仅寻求“自我”认同、“自我”验证的自娱自乐，而是需要在人类知识体系之中确证其科学性并获得“他者”的认

①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20页。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同，通过“他者”的检验的叙事过程。有效的对外传播是通过“他者”认同和检验的重要前提。因此，提升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传播效能，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①]显得尤为重要。不容忽视的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讲好中国故事，进一步塑造国际形象，以中国人的“文明互鉴”超越西方人的“文明冲突”,以“和合共生”的东方智慧打破“修昔底德陷阱”的西方假定，这些都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路径。探索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有效路径，需从传播内容、传播队伍、传播载体三方面协同着力，努力使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国际上既“传得开”又“叫得响”。

在传播内容建设方面，传播议题的设置需要建立在对国际舆论场域和动向的深入研判基础上，聚焦世界普遍关注的中国问题与关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世界问题，以紧跟时代潮流的传播话题提升内容的吸引力。叙事话语需要注重“陈情”与“说理”的有机结合，既展现出中国对自身问题的有效应对，又展现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大国担当，全方位彰显中国知识体系的生命力，使受众听得懂、能认同，以能够凝聚受众共识、引发受众情感共鸣的叙事话语提升内容的感染力。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诞生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尽管也有文化主体性的价值诉求，但它也是一个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和文明发展趋势的前瞻性、开放性的文化形态和新的图景，故此，作为叙事关键的传播内容必须体现时代特色和世界关切。

在传播队伍建设方面，需要打造一支在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走向世界过程中承担传播、阐释、宣介与推广责任的体现多元行动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传播主体。这一多元主体主要包括：作为主导力量的国家机构和官方代表；作为知识生产源头和核心传播载体的高校与科研院所；承担传播中国理论与实践叙事的新闻媒体与出版机构；通过文化“出海”、社交互动、技术赋能等形式发挥柔性传播效应的各类新型传播主体等。为了提高国际传播主体的叙事能力和传播效果，一方面要加强学习自主知识体系的相关理论、国际传播的相关经验，增强国际传播的综合本领；另一方面要完善传播评价机制，支持各类传播主体有组织地开展联合交流活动，鼓励传播主体在国际舆论中积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在传播载体建设方面，需要拓展传播载体的范围，利用传统媒体公信力强、权威性高、覆盖特殊受众等优势，以及新兴媒体传播速度快、互动体验性强、呈现形态多样等优势，打造多元化、立体化的传播载体矩阵，以满足不同受众偏好，丰富传播形式和表达方式，使传播载体能够触达更多的受众。必须把牢媒体传播的正确舆论导向，善于利用和融合多元载体的反馈功能，依托数智技术的算法分析监测舆论动态，及时制定并实施有效的干预方案，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传播营造健康氛围。不容忽视的是，语言作为关键载体，在国际传播中发挥着价值沟通、认知塑造、文明传递、共识构建等直通而快捷的作用。显然，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化传播中，以中文为主的国际传播载体在确保原创性与完整性、精准性与深刻性以及打破“他塑”困境、实现“自塑”形象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中文教育国际推广、中文翻译质量提升、中文普及广度与影响力拓展等方面，仍有不少的路要走，需要我们在不断推动标准建设、技术赋能、海外拓展与跨文化管理等方面实现中文国际化的高质量发展。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汪爽对本文的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建构与制度路径研究”（24AZD006）的阶段性成果。］

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34页。